

明末以降黄海东岸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及原因 (1570–1835)

陈 亮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1570–1835 年间, 黄海东岸鲱鱼资源数量经历了明显的盛衰变化。1570、1775、1830 年是鲱鱼资源走向衰落的关键年份; 而 1603、1799、1835 年则是由衰转盛的关键年份。虽然黄海东、西两岸的鲱鱼资源同属一个地方种群, 但其资源盛衰的趋势并非完全一致。上述变动与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有关。

【关键词】黄海; 鲱鱼; 数量变化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6-0063-14

The Fluctuation of Herring(*Clupea Pallasii*) Resoueces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Korea Peninsula during 1570–1835

CHEN Liang

(College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The herring(*Clupea Pallasii*) resoueces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Korea Peninusula had ever experienced obvious fluctuations since 1570–1835. The key years that the herring fishery declined from prosperity were 1570, 1775 and 1830. However the year 1603, 1799 and 1835 were the key yeras that the herring fishery turned bo be prosperous. Although the herring resources distributed along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oast of the Yellow Sea belong to only one local population,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herring resources were not syn-chronous.The above fluctuations are related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Yellow Sea; herring; fluctuation

李朝后期著名的农政学者徐有桀(1764–1845)在其所著《兰湖渔牧志》一书中曾对朝鲜半岛的海产鱼类名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释, 内中提到:

青鱼, 色青故名。冬月产关北海洋, 冬末春初循东海迤南至岭南海洋, 其产益繁; 又迤西至海西之海州前洋, 则更益肥美。其行千万为群, 随潮拥咽而至, 迨三月而止。与本草青鱼同名异实, 故《东医宝鉴》注《本草》青鱼亦云非我国之青鱼也。惟《和汉三才图会》云: 鲭形类鲩而鳞细, 大者长一尺四、五寸, 背正青色, 中有苍黑微斑文如绳缠, 然尾边两两相对有刺髻, 其肉甘而微酸, 易馁, 经宿者令人醉。四月中, 数万为浪所漂, 不钓不网, 亦可获取。其所云数万为浪所漂者, 非我国青鱼, 何以有此。是知我国及日本鲭鱼同是海产, 而本草所言另是江湖产一种也^①。

【收稿日期】2017-06-26

【基金项目】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2014BSJJ011)

【作者简介】陈亮(1981–), 男, 郑州轻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海洋生物种群历史。

^① 徐有桀:《兰湖鱼名考》上卷《鱼名考·海鱼》, 自然经室藏板, 纯祖二十四年(1824)刻本。

作为李朝药学史上的一部巨著,《东医宝鉴》于光海君五年(1613)正式刊刻;而正德二年(1712),日本传统时代著名的百科全书《和汉三才图会》也在大阪付梓。从渔汛时间以及体形特征上来看,文中所提到的青鱼、鲭鱼分别是太平洋鲱(*Clupea pallasii*)在朝鲜以及日本的地方俗名,而不同地域的鱼类又分属不同的地方种群。作为太平洋鲱(*Clupea pallasii*)10个地方种群当中栖息地纬度最低的一个,黄海群主要分布在中国辽东、山东半岛沿岸以及朝鲜半岛西岸,具有相对独立的活动区域。东朝鲜群则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东部沿海^①。目前为止,对这种资源数量曾经发生过剧烈变动的鱼类,水产学家虽然仍未完全掌握它的变动规律及原因,但来自于史学领域的长时段研究开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得益于欧洲丰富的渔场贸易统计、航海日志、税务档案等史料,西方学者通过长时段研究,对17世纪以来北海、波罗的海、白海、巴伦支海等地鲱鱼资源数量的剧烈变动及其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②。虽然东亚各国缺乏类似的数据以及统计史料,但却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字材料。李玉尚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资料的长时段研究,揭示了过去500年来黄海西岸鲱鱼资源数量波动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可能造成鲱鱼资源丰歉变化的原因^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还给出了历史上黄海西岸鲱鱼资源数量出现剧烈波动的若干关键时点以及鱼群分布区域的变化。

在黄海东岸,韩国水产学家朴九秉最早对李朝的青鱼捕捞业进行了研究^④。他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渔业生产、捕捞技术等传统的渔业史研究领域,而历史学者金文基的研究旨趣则略有不同。他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讨论了东亚地区鲱鱼、大口(鳕鱼)、明太(金线狭鳕)三种冷水性鱼类渔业的兴起,并将其视为全球气候变动中“无言的见证人”^⑤。虽然,金文基的研究注意到了气候变化与鲱鱼资源数量变动之间的关系,但他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在气候变冷的大环境下,这三种经济鱼类的捕捞业是如何兴起的,而对于历史上鲱鱼资源数量发生剧烈变化的几个关键时间段以及分布区域的伸缩变化则较少论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李玉尚利用《李朝实录》对15-16世纪黄海西岸鲱鱼资源数量和分布范围的波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给出了鲱鱼资源发生剧烈波动的关键时间点和分布范围的伸缩变化^⑥。

要想对整个黄海鲱鱼资源数量变动的状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离不开对黄海两岸的相关研究。然而,由于史料记载详略上的限制,17世纪之后所编修的《李朝实录》中鲜有关于鲱鱼的记载。但《承政院日记》、《日省录》以及李朝时代文人的文集等资料中则保留了大量有关鲱鱼的史料。本文拟以黄海西岸为参照系,通过对上述的梳理,给出明末以降近三百年来黄海东岸鲱鱼资源数量出现剧烈波动的几个关键时间点以及鱼群分布区域变化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初步勾勒出19世纪之前整个黄海区域内鲱鱼资源数量变动的状况。

① [日]千国史郎:《西北太平洋鱼类资源》,联合国粮农组织,1985年,第70页。

② Bo Poulsen. Dutch Herring: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1600-1860, Aksant Academic Publishers, Amsterdam, 2009; Dmitry L. Lajus, Yaroslava I. Alekseeva, Julia A. Lajus. Herring fisheries in the White Sea in the 18th-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ies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tch fluctuations, Fisheries Research, 2007, 87(2-3): 255-259; Jürgen Alheit and Eberhard Hagen. Long-term climate forcing of European herring and sardine populations, Fisheries Oceanography, 1997, 6(2): 130-139; Bo Poulsen, Poul Holm and Brian R. MacKenzie. A long-term (1667-1860) perspective on impacts of fishing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ility on fisheries for herring, eel, and whitefish in the Limfjord, Denmark, Fisheries Research, 2007, 87(2-3): 181-195.

③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3-294页。

④ [韩]朴九秉:《韩国渔业史》,(首尔)正音社,1984年,第81-86页。

⑤ [韩]金文基:청어, 대구, 명태:소빙기와 한류성어류의 박물관, 대구사학, 2014, Vol.115:195-257.

⑥ 李玉尚:《明代黄渤海和朝鲜东部沿海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及原因》,《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

一、“辽东人谓之新鱼”:海西青鱼的消失与重现(1570-1644)

作为李朝后期实学之集大成者,李圭景(1788-1856)在文中曾提到:“青鱼,鳞族中至繁者也,皇明末忽产于辽东等海,名以新鱼,我东则退计百许年前甚盛。”^①整个15世纪,朝鲜西海沿岸各地盛产鲱鱼。直到1505年后,随着资源数量的锐减,鲱鱼的主产区才由西海变成了东海。李圭景文中所言“退计百许年前甚盛”当指的就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笼统地提到了明朝末年鲱鱼忽然出现在辽东沿海等处,但具体何时却并未言明,而更为详细的信息则仍需参考当时学者的记载。

李朝学者申炅(1613-1653)在记载明万历年间爆发的“壬辰之役”(1592-1598)这一历史事件时,特别提到了当时朝鲜半岛各地所出现的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其中就包括:“又东海鱼产于西海,渐至汉江;海州青鱼,自十余年绝不产,移产于辽海,辽东人谓之新鱼”^②。从时间上推断,海州沿海至迟在1580年以来就已经不产青鱼,原本兴盛的青鱼捕捞业开始衰落,而此时辽东沿海则出现了青鱼旺产的局面。或许是很久未曾见到过这种鱼,所以辽东当地渔民才称其为“新鱼”。

关于此次西海青鱼消失的准确时间,李睟光(1563-1628)给出了更为具体的答案。他在文中提到:“青鱼,每春时多产于我国西南海中,自先王朝庚午以后绝不产,而闻中朝青州之境多产云,岂物产亦以时变迁欤?或言医方所谓青鱼,非我国之青鱼也。”^③按《芝峰类说》一书系李睟光于光海君六年(1614)完成并刊刻,其文所指“先王朝庚午”应为宣祖三年(1570)。在此之前,西海青鱼偶尔仍能见到,只是产量较为稀少,但此后则基本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位于对岸的山东青州府多产青鱼的消息也已经传到朝鲜半岛。

按黄海鲱在黄海西岸的的产卵场位于山东威海沿海,其中又以荣成爱连湾为最。根据李玉尚的研究,爱连湾海域在明代史籍中为“青鱼滩”海口,因青鱼出现持续旺产才有人迁居至此形成村落^④。登州府青鱼滩村的建立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而这一时间恰与李睟光所记载的青鱼消失于海西而多产于青州的时间大体一致。

至迟在万历七年(1579)莱州府即墨县知县许铤开始编纂县志之时,当地就已经有出产鲱鱼的记载,而胶州出产鲱鱼的记录也不会晚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莱州府志》刊刻之时^⑤。明代青州府北部的寿光、乐安、博兴三县位于渤海沿岸,而南部的诸城、日照两县则濒临黄海。嘉靖四十四年(1565)刊刻的《青州府志》只记载了当地曾出产淡水青鱼^⑥。明代即墨、胶州两地与青州府的诸城、日照毗邻,通过上述两地出产鲱鱼的情况来看,李睟光所述青州府出产的青鱼当来自诸城、日照沿海。

这里仍需说明的是,辽东沿海一带在此之前并非不产青鱼。明正统、成化年间,旅顺至丹东一线应有一支青鱼鱼群分布,但由于《辽东志》所记载的信息过去简略,其具体位置仍不得而知^⑦。不过,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金州卫在给山东监察御史的一篇关于所属网户拖欠鱼课的呈文中,明确地提到了

①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万物篇·虫鱼类·鱼》,韩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② 申 炅:《再造藩邦志》,收入朝鲜古籍刊行会编:《朝鲜群书大系·第九辑·大东野乘·卷三十五》,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第360页。

③ 李睟光:《芝峰类说》卷20《禽虫部·鳞介》,光海君七年(1614)初刻,光武元年(1897)重刻本。

④ 李玉尚:《海湾环境变迁与黄海鲱中心产卵场内部的变动》,《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⑤ 李玉尚、陈亮:《明代黄渤海和朝鲜东部沿海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及原因》,《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

⑥ 嘉靖四十四年刻本《青州府志》卷7《地理二·物产》。

⑦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

渔民捕捞青鱼的地点就在金州卫下辖的近岸岛屿附近^①。此后的几十年中,或许是青鱼消失的时间太久,所以在50年后重现时才会被当地渔民称为“新鱼”。

朝鲜西海的青鱼捕捞业在17世纪初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全罗道沿海出现了青鱼盛产的景象^②。同样作为“壬辰之役”的亲历者,时任领议政一职的柳成龙(1542-1607)在记述战况时亦曾提到:“海州所产青鱼,近十余年绝不产,移产于辽海,辽人谓之新鱼。然则当时惟海州有之,虫鱼之属,每逐风气至。近岁此物极贱于西海,又不知辽之有无也。”^③按《惩毖录》系柳成龙1600年归乡后所著,而此时已消失多年的青鱼开始大量出现在朝鲜西海各处,以至于给人留下了“此物极贱于西海”的印象。海西青鱼的重现也使得柳成龙开始关心对岸辽东半岛的渔汛状况。

天启四年(1624),朝鲜朝天使臣赵澱(1568-1631)在返程途中曾在登州府黄县的驿馆停留。他在一首题为“黄山馆”的诗中特别提到:

黄山馆里客来投,古驿萧条古木稠;青鱼却似吾乡味,白酒堪消异地愁。

东枕沧溟波浩浩,西连京国路悠悠;明到登州嗟不晚,天教风便稳归舟。^④

黄山驿始建于洪武九年,为明代黄县西南一处重要的驿站^⑤。天启元年,由于后金在辽东地区的崛起,陆路被堵,朝鲜使臣朝天不得不寻求海路,取道登州赴京。三月十八日,赵澱一行“早发,过新城千户所,到黄山馆中火,自此沿海而行近五里,夕到黄县宿。”^⑥虽然此时驿馆已经萧条,但午餐却在异乡尝到了熟悉的青鱼,这也勾起了赵澱的思乡之情。根据李玉尚的研究,乾隆、道光年间,登州府沿海一带青鱼旺汛一般在惊蛰和谷雨之间,约在阴历二、三月,持续一个多月^⑦。从赵澱等人到达黄县的时间来看,应该正是青鱼上市之时。而从青鱼在山东半岛的洄游路线来判断,既然此时黄县出产青鱼,那么东部的蓬莱、福山、牟平、荣成等地亦应出产青鱼。

17世纪初,西海青鱼重现后的盛况并非昙花一现,旺产的局面在此后也得到了延续。宣祖时期著名的文臣沈光世(1577-1624)在其诗作中曾提及江华岛:“此土男贱女贵,人多未娶,俗尚海采,而沉水者少。端午正朝,俗竖竹迎神,人争迎祭。青鱼每岁来施卵而去,立从所见,篇中及之。”^⑧位于京畿道沿海的江华岛,因为有了大量来此产卵的鱼群而形成旺汛。仁祖四年(1626)十月初三,群臣关于对江华岛周边海域捕捞鱼虾课税以资军粮的建议得到了准许,其理由之一便是“有船之人,贸贩青鱼之利甚多”^⑨。除此之外,仁祖初年,黄海道海州康翎县沿海也有青鱼旺产的记载^⑩。

仁祖十五年(1637)11月4日,左承旨金尚在讨论各地“荐新”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时曾提到:

曾见全罗监司状启,生鲜之代,以青鱼分定云,而青鱼时未产出,虽或产出,新产之物,其价必高,想未多贸,生鲜一事,极为可虑。侧闻京畿海边捉鱼为业之人,尚有余存者云。木绵

①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上》,辽沈书社,1985年,第385-386页。

② 《李朝宣祖实录》卷164,36年7月20日。

③ 柳成龙:《惩毖录》卷4《录后杂记》,收入姜亚沙、经莉、陈湛绮编:《朝鲜史料汇编18》,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第437页。

④ 刘晓东:《明代朝鲜使臣胶东纪行诗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7页。

⑤ 《登州府志》卷14《驿传》,光绪七年刻本。

⑥ [韩]林中基编:《燕行录全集》第1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27页。

⑦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7-278页。

⑧ 沈光世:《休翁集》卷2《五言排律·咏怀百韵,寄洪上舍勉叔兼柬许名隐、赵雪竹、田西亭三先生》,仁祖十四年(1636)初刻,哲宗十年(1859)补刻本。

⑨ 《承政院日记》,1626年10月6日。

⑩ 《李朝仁祖实录》卷20,7年3月5日。

若干同,送于南阳、仁川、安山、富平、金浦、通津、乔桐、江华等官,分给捉鱼人,从便贸得上送事行会。^①

海产品等生鲜物品的“荐新”,尤重时效。但青鱼往往因新上市后价格较高或者渔汛较差难于捕到,以至于全罗道在执行此项任务中多有不便。金尚的建议在于就近让京畿道沿海各地的渔户在海上代为贸易青鱼,这样一来便可缓解各地在荐新时所遇到的难处。从金尚的建议来看,全罗道、京畿道沿海地区当时都应产青鱼。

此外,地处黄海道北部的平安道沿海也有出产青鱼的记录。仁祖十九年(1641)12月18日,右副承旨南铉在朝会时特别提到:“世子宫,年例入送青鱼五十口,今当入送,令该曹禁军别定入送,使之交付于平安监司处,何如?传曰,允。”^②作为平安道的最高行政长官,平安监司将对世子宫的青鱼年例负总责。将世子宫的青鱼年例交与平安道,说明此时在西朝鲜海湾确有一支鱼群分布。

李朝宣祖三年(1570)前后,青鱼资源消失于黄海东岸,而此时位于黄海西岸的辽东半岛以及山东半岛沿海则出现了青鱼资源旺发的景象。鲱鱼的丰歉变化与海水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李朝官员似乎对此早有了解。1758年10月24日,庆尚道监司李景祐向英祖寄来了自己请罪的表章,其中缘由便是:“十一月令荐新进上及同月节膳进上生青鱼,日气温暖,鱼迹顿绝,限内不得封进。”^③各道官员在不能按时向京城寄送青鱼时往往都将气温偏高作为延期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华北地区在1500年之后大约有一个近70年的相对温暖期,1570年后开始转寒^④。青鱼资源西迁的时间与华北地区气候转寒的时间基本吻合。此后,至少在17世纪初,黄海西岸的青鱼渔业一直都较为繁荣;而至迟在宣祖三十六年(1603),黄海东岸的青鱼资源也已经重新兴盛起来。海西青鱼的复出当与1600年秘鲁埃纳普蒂纳(Huaynaputina)火山爆发所造成的北半球多地的降温有关^⑤。青鱼资源分布范围的变化如图1所示。



图1 1570–1644 年黄海鲱鱼分布示意图

① 《承政院日记》,1626年11月4日。

② 《承政院日记》,1641年12月18日。

③ 《承政院日记》,1758年10月24日。

④ 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97页。

⑤ 费杰:《公元1600年秘鲁 Huaynaputina 火山喷发在中国的气候效应》,《灾害学》2008年第2期。

二、“此地谓之朝鲜鱼”:鱼群分布范围的扩大(1645-1750)

明清鼎革之际,黄海两岸的渔业生产似乎出现了一次短暂的衰落。1651年5月15日,李回宝(1594-1669)在给孝宗的一则奏疏中曾提到朝鲜各地近十年来“水族渐竭”^①。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麟坪大君李滉(1622-1658)作为陈奏正使出使清廷。九月初八,一行人抵达宁远卫下辖的塔山中左千户所时也发现,“自此至山关,所经皆海岸,曾前经过时,市有海鱼,今则如扫,不独吾东海渴,燕辽亦如是乎?”^②李滉乃孝宗之弟,自1642-1657年间曾九次出使清廷,对山海关至锦州沿海地区所产鱼类当不陌生。此时,辽东湾与朝鲜西海的渔业生产都出现了衰落的状况。

从朝鲜半岛气候史的相关研究来看,1650-1660年间正是小冰期内气候相对潮湿的年代,各地降雨较多。这一状况直到1680年前后才有所改变,气候逐渐变成以干冷为主^③。清代初年黄海东岸青鱼资源的减少或许是受到了多雨气候的影响,不过这一影响所持续的时间应该不长。

康熙十一年(1671),清廷下令开始编纂《大清一统志》,各省按照州县志成而修府志,自下而上的顺序逐级汇纂。山东半岛沿海各县所编纂的方志大都在康熙十二年(1673)前后告竣。然而,由于“三藩之乱”的影响,辽东各地所修志书的完成则要等到十年之后。从志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清初山东半岛青鱼多分布在日照至莱州湾掖县一线,其中尤以登州府北部沿海地区产量最大^④。

此时,朝鲜西海各地的鲱鱼渔业也开始呈现出较为兴盛的局面。肃宗时期的文臣赵宗著在诗文中就曾提到:“素绿初萌荠叶开,青鱼新自海州来;糝羹发越调三味,不羨侯家煮豹胎”^⑤。产自海州的青鱼成为京城官员在春季可以享用的一种美食。不仅海州青鱼旺产,南部的全罗道沿海青鱼资源也十分兴盛。

1678年12月21日,右承旨申厚载在昌庆宫向肃宗转奏了司饔院官员关于扶安县狷岛所发生的捕鱼纠纷的报告,内中提到:

本院渔夫之设,专为御供,事体莫重。故渔夫之渔采往来时,如地税斜水等役,一切停免,盖遵法典内司饔院渔夫蠲贡赋外杂徭之意,而渠辈仅仅保存者,赖有此耳。近来国纲解弛,法令寝废,渔夫等法外被侵者,比比有之。至于全罗道扶安狷岛,则乃是青鱼所产之地。格浦居民数三人,称以监考,主断渔场。当其捉渔之时,私船渔人,则私自纳赂,择其渔场正地而与之,本院渔夫,则一切驱逐,使不得接足。渔夫等不敢下手,空手而归,渠皆失业,莫重日下役供,亦不能办纳^⑥。

司饔院为李朝掌管御膳以及宫廷内三餐的部门,故隶属于该院的渔夫在捕鱼过程中可享有免税和免除徭役的特权。扶安县狷岛为鲱鱼在黄海东岸的一处十分重要的产卵场,渔业资源相当丰富。原本只能由司饔院所属渔夫进行专属捕捞的渔场也引起了外人的觊觎。除此之外,当时狷岛的青鱼税收还是维持李朝最高学府“成均馆”日常运营的一项重要来源^⑦。1681年,时任全罗道观察使一职的申翼

① 李回宝:《石屏集》卷4《疏·求言应旨,辛卯五月十五日》,1913年重刊本。

② 李滉:《松溪集》卷6《燕途纪行中·日记》,英祖五十年(1774)刻本。

③ Chang-Hoi Ho, Wom-Tae Yun. Korean Climate Change Assessment Report 2010(Technical Summary), Seoul: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Korea, page7-8.

④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

⑤ 赵宗著:《南岳集》卷1《七言绝句·新尝菜羹戏题》,肃宗三十年(1704)刻本。

⑥ 《承政院日记》,1678年12月21日。

⑦ 《承政院日记》,1681年7月26日。

相(1634-1697)在给肃宗的一则报告中亦曾提到猬岛,“本一捉鱼之所,人号利窟。”^①

肃宗二十年(1694)10月13日,掌令金灏在论及诸多官员的不法行为时专门提到格浦金使李晚芳在青鱼渔汛到来之际,大肆贪污渔获,中饱私囊。按格浦为扶安县下辖之镇,古群山岛以及猬岛近海为青鱼在朝鲜西海一处十分重要的产卵场。从李晚芳私占渔利的情形不难看出当地渔业资源之盛。与此同时,司谏李征明也借此机会适时提到:

古群山,在海中百里之地,皆是石山,无寸土可耕,岛民专以渔业资生。若失渔业,则无他生路。近来自监营、本镇、本官及京中诸军门,侵渔多端。捉取青鱼时检营[禁营]、四学两处所收之税及勒征之数,一船所纳,几至四十同。鱼贵之时,则一同之价,至于三石之租。以此计之,惟此一税,已过百石之租。^②

从各有司衙门所收取的税赋之重亦可看出群山、猬岛近海青鱼资源当十分兴盛。1701年冬,曾任户曹判书的柳命天(1633-1705)被贬至全罗道智岛。次年春,当地的青鱼捕捞盛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诗文中提到:“渔人小少惯行商,春到帆樯顿改妆;闻说碧鱼新泼泼,明朝催向七山洋。”^③按海州古称碧城,碧鱼即鲱鱼在朝鲜的一个俗名;而今全罗北道灵光郡法圣浦前海、猬岛、金锁湾,一直到古群山群岛的飞雁岛之间七个岛屿的海域一般被称之为“七山洋”。从诗文中不难看出当地青鱼渔业之盛。

李玉尚的研究表明,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三十四年(1695)之间,因为气候短暂的回暖,位于黄海西岸的胶州沿海,青鱼资源数量开始减少,分布区域逐渐北移^④。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海东岸,此前青鱼一直旺产的全罗道猬岛也出现了大幅减产。1704年7月20日,肃宗在昌德宫召见群臣。全罗道监司闵镇远在奏疏中提到:

盖猬岛青鱼收税,专属本镇,备纳成均馆税银,而取其余,以补金使以下朔料矣。今年青鱼绝种,税银办备,实无其路。而成均馆养士之资,亦难全减。闻自本馆,今年减其税三分之一,只征二百两云,此与灾减无异,税银二百两,则令赈厅划给于成均馆,而猬岛今年渔税,则减除似当矣。上曰,依为之。^⑤

在转述完闵镇远的奏疏后,左议政李畚接着向肃宗提到:“猬岛常时青鱼之利,成均功税[贡税]外,所余颇优,故属诸本镇,使之取资,且陈京司差人之弊,此则未为不可。而近因青鱼稀产,反为本镇之弊云。”猬岛沿海捕捞青鱼所交之税,除了供给成均馆日常办学所需外,所余税额仍然较多,这也就成为了全罗道地方各衙门一项十分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由于1704年青鱼完全消失,成均馆的日常开销却仍需由全罗道负责。由于青鱼减产,原本便利地方的一项政策却成为了一个难题。

然而,此次减产所影响的区域则较为有限。1709年,肃宗时期著名的诗人洪世泰(1653-1725)因丁母忧而回到了位于黄海道瓮津半岛的故乡。当地渔民每年在寒食、谷雨前后用定置网具捕捞青鱼的盛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⑥。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初,辽东湾西岸也出现了青鱼旺产的景象。康熙五十六年(1717)12月26日,礼曹判书李观命(1661-1733)作为副使出使清廷。次年春,使团在返程途

① 申翼相著,申瀟编:《醒斋遗稿》第六册《状启·在湖南时状启》,纯祖三十四年(1834)刻本。

② 《承政院日记》,1694年10月13日。

③ 柳命天:《退堂先生诗集》卷5《南迁录·杂咏二首》,收入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4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6年。

④ 李玉尚:《1600年之后黄海鲱的旺发及其生态影响》,《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

⑤ 《承政院日记》,1704年7月20日。

⑥ 洪世泰:《柳下集》卷4《诗·牛渊》,英祖六年(1730)刻本。

中偶然间品尝到了青鱼。李观命在这首题为“见青鱼有感”的诗文中特别提到:“青鱼,我国鱼,此地素无之,十数年来,多捉于此,此地人初不知名,称以朝鲜鱼云。”^①

《屏山集》卷二所收录的诗文均为李观命出使清廷途中所做,所有诗文均按照写作时间进行排序。李观命在下一首诗中曾言及途中尝到的另一种美味,“关内外水味恶不堪食,冷井之水颇清冽,每使行到此,必临水采芹而食之。”冷井为朝鲜使团贡道中的一处站点,其位置在今辽阳县附近。从两首诗写作的前后顺序来看,李观命见到青鱼应该在其抵达辽阳之前。

康熙十八年(1679)清政府出于海防的考虑,禁止朝鲜使臣经过牛庄,贡道自此从辽东到广宁一段改道,需绕道盛京、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最终抵达广宁。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使团每天行程六十里,从渡过鸭绿江到北京一般要三十天左右^②。李观命等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3月27日方才得到了康熙皇帝“此项贡物带回路远艰难,著留抵下次常贡”的谕旨^③。据此推算,其回程日期最早也应当在三月底,而使团抵达辽阳的时间则应大致在4月10日前后。

按道光年间,威海以及临榆等地鲱鱼渔汛约在农历二、三月之间,持续一个多月。据此估算,此时青鱼渔汛应当已经结束,而腌制好的鲱鱼则刚刚开始上市。故而,李观命所见到的青鱼,应来自山海关至辽阳的某处驿站附近。青鱼不是当地常产鱼类,这才使得时人有“此地素无之”的印象并将其称为“朝鲜鱼”。

虽然,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后,锦州府所辖之宁远州、锦县以及奉天府所辖之盖平县、辽阳县、铁岭县在纂修志书时都列有“青鱼”,但都只记载鱼名,很难判断该鱼是否就是鲱鱼^④。但是,从李观命的记载来看,这支洄游到辽东湾西岸的鱼群所出现的时间应不迟于18世纪初且至少持续了近二十年。

清朝虽然处在小冰期内,但仍然存在着一个气候的相对温暖期(1700-1770)。在这七十年内,其间最冷的年代出现在1720年代,中国东中部地区冬季温度较1951-1980年平均偏低0.2℃^⑤。在朝鲜半岛,历史文献资料也表明1700-1710年气温相对较低,而树轮资料的研究也表明1700-1730年是朝鲜半岛小冰期内一个十分寒冷的时段^⑥。而相对寒冷的气候则有益于青鱼资源的旺发。

此外,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沿海,雍正年间也有青鱼旺产的记录。雍正十二年(1734)成书的《盛京通志》曾提到,奉天府宁海县沿海因为盛产青鱼而引来了大群尾随而至的鲸^⑦。乾隆十一年(1746)正月二十日,徐季年等九名船员从松江府上海县起锚出发。四天后,货船遭遇狂风漂流至朝鲜黄海道吾叉浦沿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此行原本的目的地为辽东,而所要贩运的货物则正是当地盛产的青鱼^⑧。从时间上来看,正月、二月间正是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渔民捕捞青鱼之时。辽东沿海该地区旺产的青鱼资源吸引了远在江南的客商进行长途贩运,而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地青鱼资源之盛。

与此同时,黄海东岸青鱼资源也持续旺产。1720年,任墉(1640-1724)被贬谪至黄海道的金川郡。他在诗文中曾提到:“东则君家西我庐,并临江水隔崖居;日闻汀树啼黄鸟,时有渔船卖碧鱼。”^⑨流经

① 李观命:《屏山集》卷2《诗·见青鱼有感》,奎章阁藏本(图书番号:奎6202)。

② 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727页。

④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9-240页。

⑤ 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89页。

⑥ Chang-Hoi Ho, Wom-Tae Yun. Korean Climate Change Assessment Report 2010 (Technical Summary), Seoul: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Korea, page7-8.

⑦ 《盛京通志》卷27《物产·水族之属》,乾隆元年刻,咸丰二年重修本。

⑧ 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原编》卷71《漂民·六·上国人·丙寅报吾叉浦漂人发回咨》,高宗十八年(1881)刊本。

⑨ 任墉:《水村集》卷5《诗·次新韵》,英祖三十六年(1760)刻本。

金川郡的礼成江在江华湾入海,贩卖青鱼的渔船正可溯江而上。

《海州志》创修于宣祖二十九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方才进行补修。但稍显遗憾的是,志书在两次修成后均未刊刻,草稿至乾隆初年时已经漫漶不清。有鉴于此,乾隆三年(1738)夏,海州判官申宗夏遂召集崔活、安圣时对旧志进行整理、补修,当年全部工作即告完成。志书中记载海州所产鱼类甚多,其中“青鱼”位列首位,足见其重要性^①。李朝实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瀾(1681-1763)亦曾提到当时海州渔民捕捞青鱼的盛况,每到“孟夏之月,青鱼塞海,方数百里间,人无不食。”^②

海州南部的全罗道全州府万顷县沿海,此时亦产青鱼。雍正五年(1727)编修的志书中对当地土产多有记录,内中罗列如下:“青鱼、石首鱼,俱出古群山岛;鲫鱼、苇鱼、真鱼、秀鱼、蟹、蛤、姜[今无]、芡、菱、莲;【新增】:大虾、乌贼鱼、盐。”^③志书的记载基本沿袭了《东国輿地胜览》,但对于“昔有今无”的物产以及较原本新增的大虾、乌贼鱼等品种都作了标注。产自古群山岛的鲱鱼和小黄鱼仍位列所有土产品的前两位,足可见这两种渔业之盛。

清初以来,黄海两岸青鱼资源均呈现出旺产的局面,只是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出现了一次短暂的衰落,随即便又重新兴盛起来。与17世纪上半叶相较,黄海东岸鱼群分布的区域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然而,在黄海西岸,鱼群的分布范围则有了明显的变化。辽东、山东半岛沿海青鱼资源持续旺发的同时,至迟在18世纪初,已经有一支鱼群洄游进入渤海辽东湾西岸海域。

三、乾隆中叶的盛衰变化(1751-1774)

1750年,英祖颁布了一项旨在保证收支均衡、减轻税收并试图使人民负担平均化的法令,即“均役法”。其具体做法是,对原先以缴纳布匹代替兵役的人头税“军布”减半征收,而过去被王族及其他权门势家私占的渔税、盐税、船税改由政府所设立的“均役厅”征收,以补充因军布减半征收所造成的财政上的不足。然而,就在这一新法刚刚颁布之际,已经有人将市面上鱼类、食盐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均役法的施行联系起来。

1751年6月9日,英祖在崇文堂召见群臣并发出了“渔盐之贵,果是均役之弊耶?”的疑问,时任校理一职的韩光肇则认为:

臣初入闻之,则果有是言矣,及入浦口,则大异于初头所闻。盖昨年雨水连仍,故不能煮盐,且防疫死亡者,皆过葬于秋冬,无暇刈柴,柴贵如桂,故亦不得煮盐。盐之贵,良由于此。自定税前,已极贵矣。上曰:盐之不可恃如此夫。光肇曰,今则盐价颇歇矣。青鱼之贵,则以风气不好,故未能善捉,而石鱼道味则至贱矣。^④

韩光肇将青鱼价格的上涨归结为气候原因所造成的歉收,但他也发现在鲱鱼减产的同时,小黄鱼依旧旺产。按鲱鱼属冷水性上层鱼类,对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较为适应,而石鱼(小黄鱼)则适宜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下生存。两种鱼类所适应的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差别。此次青鱼价格的上涨并未持续太久。1754年4月19日,英祖在熙政堂召见群臣时曾问到:“今年海错之贵何如?”而他从大臣们那里得到的答案则是“今年则海州青鱼不贵矣”^⑤。

① 崔活、安圣时纂:《海州邑志》卷上《土产·鱼类》,英祖十四年(1738)修,1937年铅字重印本。

② 李瀾著,郑寅普校:《星湖僿说》卷8《人事门·生财》,(首尔)文光书林,1929年重刊版。

③ 《万顷县邑志》卷上《土产》,英祖三年(1727)修,奎章阁藏本(图书番号:奎17416)。

④ 《承政院日记》,1751年6月9日。

⑤ 《承政院日记》,1754年4月19日。

《輿地图书》是李朝英祖时期编纂的地理总志,因其包含图和书两部分而得名。1757年,洪良汉奏请编纂,经由八道监司编写各道邑志后陆续上送至京城,而整个编纂工作直至1765年方才告竣。此书也是《东国輿地胜览》编成270余年后对朝鲜地理总志的又一次补充、完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记载了全国各地的物产情况,其中就包含海洋渔业,兹将物产中列有“青鱼”的各个行政区制成表1,如下所示。

表1 《輿地图书》记载朝鲜西海岸各行政区青鱼分布

道	镇/牧	都护府/郡/县	资料来源
忠清道	洪州	洪州	上卷·页311
		舒川	上卷·页318
		瑞山	上卷·页325
		泰安	上卷·页330
		蓝浦	上卷·页376
		结城	上卷·页380
		保宁	上卷·页385
黄海道	海州	海州	下卷·页015
		丰川	下卷·页097
		长渊	下卷·页099
		康翎	下卷·页123
		瓮津	下卷·页127
		扶安	下卷·页816
全罗道	罗州	灵光	下卷·页745
	全州	兴德	下卷·页811
		扶安	下卷·页816

该书在描述各地物产状况时,如遇到“昔有今无”的状况都会明确加以记录。如果将此书与《东国輿地胜览》相较,则忠清道、黄海道、全罗道出产青鱼的地点基本一致,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而最大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平安道。15世纪末,平安道宣川郡沿海有青鱼出产的记录,而1640年前后青鱼亦曾出现在当地,但这一支鱼群在1760年前后已不见踪影。

值得注意的是,李玉尚的研究表明,山东半岛的青鱼资源数量在康熙中叶之后开始下降,分布区域逐渐缩小,而至乾隆后期,分布范围再次缩小,仅分布在山东半岛高角一带^①。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一艘来自苏州府崇明县的货船在北上途中因遭遇到极端天气变化而漂流到了全罗道灵光郡沿海。从他们的供述以及朝鲜方面的调查得知,船上一行八人于二月十九日从太仓州所辖之崇明起航去往山东登州府文登县,而他们所从事的生意则是要去那里“装运青鱼”^②。农历二月,正是荣成沿海青鱼旺产之际,这种长途贩运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青鱼资源之盛。

与此同时,黄海东岸青鱼资源数量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1807年,李朝后期著名的实学派学者丁若铨(1758-1816)因“辛酉邪狱”被流放至全罗道南部的黑山岛。因为岛屿周边鱼类资源十分丰富,丁若铨遂在岛民张大昌的协助下编成了《兹山鱼谱》,而该书也被誉为李朝最早的鱼类学著作。丁氏在书中言及:

① 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

② 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原编》卷72,《漂民·七·上国人·【辛卯】报康翎灵光漂人发回咨》,高宗十八年(1881)刊本。

青鱼,长尺余,体狭,色青,离水久则颊赤,味淡薄,宜羹炙,宜醢。正月入捕,循岸而行,以产其卵,万亿万队,至则蔽海。三月间既产则退,伊后,其子长三、四寸者入网。乾隆庚午后十余年极盛,其后中衰,嘉庆壬戌极盛,乙丑后又衰盛。^①

按乾隆庚午即1750年。此后的十多年间,青鱼资源一直颇为丰富,其后开始出现衰落,直至嘉庆七年(1802)才重新兴盛起来。然而,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太长时间,青鱼资源数量在嘉庆十年(1805)又开始衰落。根据丁若铨的描述,1760-1805年间青鱼资源数量曾出现过较为剧烈地波动,但具体出现在何时则并未言明。

四、“均役之后”:青鱼资源由衰转盛(1775-1835)

1775年3月2日,英祖在集庆堂召见群臣,其间曾谈到了海州青鱼的状况。

上曰:海州有景致乎?对曰:有结城地,即青鱼所也,景概好矣。上曰:均役后,青鱼不得多捉云,然乎?对曰:谓之然矣。上曰:何故而然乎?对曰:均役前则渔箭,地方官次知,故专赖官力设箭矣;今则自官不为顾助,设箭不广,故所捉极少,鱼产极贵矣。^②

按“均役法”即英祖时期颁布的一项旨在保证收支均衡,减轻税收并试图使人民负担平均化的法令。显然,此时已经有大臣将青鱼的歉收与均役法的施行相联系起来,认为新法的实施损害了地方官原有的既得利益,既然渔业税收统一归均役厅征收,他们也就不愿再去督促渔业生产。四天后,英祖又在集庆堂召集群臣讨论这一问题。

上曰:近日海族太贵由于均役之害,承旨知之乎?载翰曰:鱼物果稀贵,而以青鱼言之,前日之价直一文钱者,今则为倍蓰矣。上曰:翰注知其事乎?贱臣履相曰:臣家在洪州,青鱼之价,果如承旨所奏矣。上曰:其故何也?载翰曰:均斤后,鱼箭不为修饬而然也。^③

前文叙及,忠清道洪州沿海各地多有出产青鱼的记载。从同副承旨赵载翰以及假注书尹履相的回答来看,他们也将青鱼减产的原因归结于均役法的实行。第二天,讨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领议政申晦、左议政李思观、右议政洪麟汉、户曹判书具允钰、吏曹判书李潭、吏曹参判徐命善等人都加入到了这一问题的讨论之中。

晦曰:青鱼号称儒鱼,今则极贵,此专由于生齿之多,而鱼族之迁徙故也。思观曰:大口时捉于海西云,以此观之,则鱼族之往来可知也。麟汉曰:均役之后,各邑则虽有所损,而于民无损矣。上曰:予以此为大事矣,反害于民云,是吾之过也,为民羞之。允钰曰:均役后,虽以官民之不得相济,不为多捉,统营有三渔箭次知者,所捉亦不如前云,大抵鱼族异于前矣。潭曰:近来鱼族之异于前者,前日不捉之处,今亦捉之,前者多捉之地,今或不捉,此专由于物产盛衰之理矣。^④

“大口”即鳕鱼的俗名,主要产自朝鲜半岛东岸,但此时西海也开始出产鳕鱼,故而引起了群臣的注意。从英祖与群臣的谈话之中不难看出,李朝的青鱼渔业确实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衰落。1777年,刚

① 丁若铨著,郑启燮笔写,洪在夏校正:《兹山鱼谱》卷1《鳞类·青鱼》,1946年刊本。

② 《承政院日记》,1775年3月2日。

③ 《承政院日记》,1775年3月6日。

④ 《承政院日记》,1775年3月7日。

刚继位的正祖曾提及:“均役后,小民不得食青鱼,其害可知矣。”^①此后,青鱼减产的局面并未得到好转。1783年10月,全罗道御史在一份报告中曾言及:“七山诸洋,设箭最多,而近少猎捉;狷岛、古群山,立船最盛,而近渐稀少。”^②七山洋、狷岛、古群山等原本旺产青鱼的地方,渔业都出现了明显的衰落。

青鱼资源大幅减产,但均役厅仍然照旧额征收,这样一来就给沿海渔民带来了极大的负担。然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似乎并非仅仅因为均役法的实施。正祖八年(1784)春,“上以海税弊痼,亲设矫揉之策而难疑答问,下询于八道两都之臣。”身在统营的俞汉雋(1732-1811)虽然职位较低,未能参与此次讨论,但也留下了自己的建议。他在文中提到:

……夫青鱼如此之多,而利如此之无穷,故浦人以此应官衙,以此供营邑,犹有余赢,至以此往往起家为千石君。时则折受横占诛求之日也,今害息矣税薄矣。青鱼之税八百者为五百,五百者为二百,二百者为五十、三十矣,青鱼几至于绝。视此鱼增减之船与盆,安得以不缩。缩已久矣,而均厅方且按海之簿而责其税。一基一箭,一盆一船无遗焉。岁二上,毋敢违限,违则下如霜之令。青鱼丰,众瘠空;青鱼贵,百疵萃。使青鱼出如旧,无一事矣。夫事之出于人为者,可以理诱,可以刑禁。理与刑之所不能行者山泽也。夫海中之青鱼,又恶能知均厅之前后,而以前则至,以后则不至哉。^③

诚如俞汉雋所言,如果青鱼资源还像之前那样兴盛,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但是,由于渔获量较之以往大为减少,此时均厅又要按原额征税,渔民完税无望,只能逃脱。渔业逐渐萎缩,渔村开始走向衰败,渔业方面的投入也就随之大幅降低。

正祖十二年(1788)6月12日,时任右通礼一职的禹禎圭也就日益严重的渔业衰败上疏正祖。他在文中提到:

大抵十数年来,渔业大不如前,浦民无以计活,终岁求鱼,虽不足以当其税,然初既尺量定税,加減不得,一向准捧,是以舟人渔子,无以堪当。……臣尝待罪于万顷县令也,闻于浦民,则皆以谓本邑之古群山,扶安之狷岛,青鱼所产也。古者百级之直不过二两钱,而今则虽以三、四十两钱不得贸百级青鱼云。数邑如此,他道可知。以京里鱼廛观之,青鱼之鲜有买卖,亦已久矣。而人皆曰:自均厅税鱼以后,鱼产绝贵云。然则鱼税可罢而盐税可捧也。京民故老皆曰:均厅以前,米既狼戾,鱼亦至贱,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矣。均厅以后,百弊层生,各种物价,比前倍蓰。^④

按禹禎圭于1775-1777年间任万顷县令,对该地的渔业生产当不陌生。其时,全罗道沿海多地的青鱼资源数量已经大为减少,鱼价较之以往则要贵出近20倍。从京城鱼市的情况来看,青鱼紧缺的状况至少在10年内并未发生改变。关于这一问题,时任左承旨的李在学在两个月后的一次讨论中亦曾提到:“物之贵贱,自有其时。均厅之前,各处征税,不胜其繁,而鱼犹不贵,适时之然耳。到今以鱼贵,责之于均厅征税之故,则岂理也哉?”^⑤只是因为青鱼资源减少的时间恰好与均役法推行的时间大致相同,才使得民众将渔业的衰败归结为新法的实施。

由于史料的缺乏,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六十年(1795)间,黄海西岸各地青鱼出产的状况并不明朗;而黄海东岸青鱼资源衰落的局面直到1800年前后才有所改善。正祖二十四年(1800)4月15日,

①《承政院日记》,1777年9月21日。

②《李朝正祖实录》卷16,7年10月29日。

③俞汉雋:《自著》卷之29《榜状·海税议》,奎章阁藏本(图书番号:古3428-328)。

④《承政院日记》,1788年6月12日。

⑤《承政院日记》,1788年8月18日。

领议政李秉模在受到正祖召见时曾提到当年的年景,“非但谷价之不腾,青鱼亦甚价贱,人皆以此而充膳云矣。”^①该年末,纯祖继位,同副承旨严耆在给纯祖的一则报告中曾言及:

瓮津、康翎等邑,近来浦利渐滋,青鱼多产。今若申飭该道,详查移定于康翎、瓮津之箭,长渊陈箭,从实顷给,则实为莫大之惠。而以海州、长渊观之,则一道沿海之邑,渔税白征之弊,从可推知。亦令查栲,可代者充代,可顷者永顷,恐合字恤之道事也。^②

此时,消失多年的青鱼在黄海道海州沿海又一次复出。由于青鱼资源数量十分丰富,鱼价也颇为低廉,而丰饶的鱼产也使得政府对于渔业税收又重新重视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在对岸的山东半岛,栖霞人郝懿行在其编撰的一部水产志书中也提到了家乡附近的黄县、蓬莱、福山等地有十分丰富的青鱼资源^③。

嘉庆十九年(1814),李朝后期实学代表人物学者丁若铨在论及青鱼的盛衰变化时曾提到该鱼,“嘉庆壬戌极盛,乙丑后又衰盛。”^④嘉庆七年(1802)是青鱼最为旺产的年份,但三年后即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波动。关于青鱼在19世纪初的盛衰变化,李朝后期博物学者李圭景(1788–1856)的记载则更为具体。他在文中提到:

青鱼,鳞族中至繁者也。皇明末忽产于辽东等海,名以新鱼。我东则退计百许年前甚盛。自己未以后,二十尾编作一级,换铜钱二、三文。自纯庙庚寅、辛卯之间,一级直四、五十文,渐至翔贵。自宪庙乙未以后又渐贱,然终不如己未以后。鱼鲜之盛衰,亦不可知也。^⑤

纯祖己未年即嘉庆四年(1799),青鱼就已经开始旺发,鱼价也较为低廉。然而,这一状况至纯祖庚寅、辛卯之间,即道光十年至十一年间(1830–1831)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市场上鱼价较19世纪初贵了二十余倍,青鱼资源数量明显衰落。然而,减产的局面也并未持续太久。宪宗乙未即道光十五年(1835),随着青鱼的再次旺发,鱼价也又一次降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从鱼价与资源数量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看,虽然两次旺发间隔时间不长,但1799–1829年间的这次旺发还是给时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颇为低廉的价格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青鱼资源之盛。

五、讨 论

1570–1800年间,黄海东岸鲱鱼资源数量经历了多次的盛衰变化。虽然大多数时间内,鱼群的资源数量在黄海两岸有着较为同步的变化,但在黄海内部仍然存在着东西向迁徙的情况。李玉尚的研究表明,明清以来黄海西岸鲱鱼资源的旺发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几次大的旺发均出现在气候由暖转冷的时期,而1600、1815则是两个关键年份。就黄海东岸而言,1570、1775年是鲱鱼资源走向衰落的两个关键年份;而1603、1800年则是由衰转盛的关键年份。

虽然16世纪前半叶有过较为湿润的气候,但1500–1650年被认为是过去一千年来朝鲜半岛温度最低且最为干旱的时段;1640–1760年则是半岛北部最冷的时段,而有关树轮的研究则提示最冷的气温出现在1700–1730年。18世纪以来干旱、寒冷的气候大约在1783年结束,随即迎来了一个短暂的

①《承政院日记》,1800年4月15日。

②《承政院日记》,1800年12月17日。

③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

④丁若铨:《兹山鱼谱》卷1《鳞类·青鱼》。

⑤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万物篇·虫鱼类·鱼》。

气候湿润期,直至 19 世纪初再次出现干旱、寒冷的气候状况^①。从气候变化的大趋势来看,16 世纪以来,朝鲜半岛的气候变化与中国华北地区大体一致。

1570 年中国华北地区的气候开始转寒,此时黄海鲱鱼的资源数量也在经历了近七十年的衰落后逐渐复苏。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黄海两岸并非一致。1570 年后,鲱鱼资源主要分布在之前较少出现的黄海西岸,而黄海东岸则鲜有分布。直到 1600 年秘鲁埃纳普蒂纳(Huay-
naputina)火山喷发后,北半球各地出现了普遍的降温过程,鲱鱼资源才开始在黄海东岸各地复出。此后的 17 世纪上半叶,黄海两岸均经历了小冰期以来气候最为寒冷的阶段,鲱鱼资源也持续旺发。

从分布范围来看,鱼群在黄海西岸主要分布在山东高角,较少进入渤海海域。但朝鲜李朝的史料则表明,至迟在康熙末年(1710)已经有一支鱼群洄游进入渤海辽东湾沿岸并在当地形成旺汛,而在此之前辽东湾的渔民在很长时间内并未见过鲱鱼。在黄海东岸,黄海道海州以及全罗道谏岛则是鲱鱼最重要的渔场。虽然京畿道、忠清道沿海亦产青鱼,但终不及海州、谏岛之盛。

由于方志纂修时间上的限制,学者只能从道光年间山东各地普遍纂修的志书中获知鲱鱼旺发的状况,对嘉庆年间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化情况则缺乏更为直观的了解。然而,从黄海东岸来看,嘉庆四年(1799)之后,鲱鱼资源至少出现了持续三十年的旺发。嘉道年间黄海西岸鲱鱼资源的旺发与 1815 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Tambora)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气候突变有密切的联系,而 1799-1829 年间黄海东岸的旺发与其有怎样的关系则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高丽大学韩国史研究室. 新编韩国史[M]. 孙科志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 [2] 邓景耀, 赵传纲等. 海洋渔业生物学[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1.
- [3] 葛全胜, 等.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4] 王仲殊. 古代中国与日本及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5] 刘晓东. 明代朝鲜使臣胶东纪行诗探析[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 [6] 杨雨蕾. 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  
(上接第 33 页)

综上所述,《相雨书》应是汉以后气象文献典籍汇编而成,所载内容全面系统翔实,广泛运用大气气象、天体运行规律、物候、动物异常行为等开展气象预报,还涉及天人感应、祈雨、祈晴等禳灾避灾的气象民俗,堪称汉唐时期气象预报技术和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流传甚广,对后世影响可谓深远。据不完全统计,自隋代《编珠》首次收录后,唐、宋、元、明、清历代有 34 部各类典籍转录或引用 60 余次。可见,《相雨书》在古代气象谚语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之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 [ 参 考 文 献 ]

- [1] 洪世年, 刘昭民. 中国气象史(近代前)[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 [2] 熊第勋. 中国气象谚语[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1.
- [3] 惠富平, 牛文智. 中国农书概说[M].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9.

---

① Chang-Hoi Ho, Wom-Tae Yun. Korean Climate Change Assessment Report 2010 (Technical Summary), Seoul: 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Korea, page7-8.